

陈胜才◎著

自由主义民主的重建及其局限

——萨托利民主思想研究

The Reconstruction of Liberal Democracy and Its
Limitations: The Research of the Democracy Thought of
Giovanni Sartori

陈胜才◎著

自由主义民主的重建及其局限

——萨托利民主思想研究

The Reconstruction of Liberal Democracy and Its
Limitations : The Research of the Democracy Thought of
Giovanni Sartori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自由主义民主的重建及其局限·萨托利民主思想研究 / 陈胜才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6

ISBN 978 - 7 - 5161 - 2236 - 5

I. ①自… II. ①陈… III. ①民主—研究 IV. ①D0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48625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孔继萍
特约编辑 李晓丽
责任校对 韩天炜
责任印制 王炳图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6.75
插 页 2
字 数 285 千字
定 价 4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导 论

民主是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在中西方政治思想上，人们谈论最多、分歧最大、最令人神往而又最使人迷惑的话题可能就是民主。从历史上看，早在 2500 多年前，古希腊时期雅典的民主制度就曾盛极一时。在这 2500 年的历史长河中，民主经历了从古代的诞生、发展、衰落到近代的“新生”和现代的歧变，这样一个不平凡的历程。人们反复探讨民主理念、探寻民主制度，极大地丰富了民主理论和实践的相关内容，当然也使人们对民主的理解和追寻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① 国内也有学者提出：我们在实践中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一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模式已经确立。^② 但海外对是否存在“民主的中国模式”却褒贬不一^③，国内学者也对是否需要民主、民主的意义、本质、形式、普适性与特殊性等问题争论不休。这些争论有利于我们加深对民主理论和进一步推进中国民主进程的认识。

西方许多自由主义民主思想家和政治家，基于“欧美文化中心论”的普遍主义志向，他们把自己文化内部形成的“自由主义民主”等政治理念，看成全世界其他文化地区都应该无条件遵从和承认的政治理念，把它定义为一种“普世的”政治理念和原则性的政治模式，不遗余力地

^①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8 页。

^② 刘熙瑞：《中国的民主模式已经确立》，《人民论坛》2007 年第 4 期。

^③ 佟德志：《海外褒贬不一的“中国式民主”》，《人民论坛》2007 年第 4 期。

向全世界推广，甚至强制推广。^①如美国政治哲学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就于1989年在美国《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季刊）杂志夏季号上发表了长文《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福山认为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解体是一切非美国自由民主模式的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的终结，从此以后全世界一切地方将是美式的自由民主制度的永恒统治。1991年，福山又进一步发挥，写成了《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在该书中福山提出：“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找不出比自由民主理念更好的意识形态”^②。在他看来，20世纪最后25年以来，从拉丁美洲到东欧，从苏联到中东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尽管“没有千篇一律地实行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度，但自由民主制度却始终作为唯一一个被不懈追求的政治理想，在全球各个地区和各种文化中得到广泛传播”^③。

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政治激进主义思潮和政治保守主义思潮一直影响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进程。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启动，思想界又出现了一种错综复杂的情况，各种观点和思潮纷纷登场。国内一部分人便借此散布自由主义民主思潮，认为自由主义民主是当代中国的必然选择。受这种思潮的影响，很多人把“自由主义民主”当成是“民主”的代名词。因此，对于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来说，如何正确认识自由主义民主理论与实践就成为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

在西方政治学家中，乔凡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是20世纪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一位集大成者。他对自由主义民主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并坚决捍卫这种所谓的“主流民主理论”。萨托利是二战后意大利政治学研究和政治学会的领军人物，《意大利政治学杂志》的创始人。他1924年5月13日出生于意大利中部历史名城佛罗伦萨，这里是文艺复兴运动的诞生地，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著名的诗人但丁、画家列奥纳多·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政治理论家马基雅维利等文化名人都诞

^① 李鹏程：《对民主概念的文化合理性的哲学考察——对三类民主概念的探讨》，《哲学研究》2004年第6期。

^② [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代序第1页。

^③ 同上书，代序第4页。

生、活动于此。1946 年，22 岁的萨托利便获得佛罗伦萨大学社会学与政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即在该校任教^①，并担任《意大利国会杂志》（II, *Parlamento Italiano*）编辑。他 1950—1956 年作为助理教授在佛罗伦萨大学讲授历史和现代哲学，1956—1963 年受聘为佛罗伦萨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1963—1966 年受聘为佛罗伦萨大学社会学教授，1966—1976 年受聘为佛罗伦萨大学政治学教授，1969—1971 年任新成立的佛罗伦萨大学政治学院院长，以后一直担任该校名誉教授；1974—1976 年受聘为欧洲大学研究所教授。

从毕业后到 1963 年间，萨托利陆续出版了多种著作，声名鹊起，此

① 萨托利曾诙谐地谈起自己获得佛罗伦萨大学教职的经历：1943 年 10 月至 1944 年 8 月，萨托利为逃避法西斯的征兵而躲藏在自家地下室中，在这将近一年的“人间蒸发”岁月里，萨托利感到聊以自慰的就是阅读哲学书籍。他大量阅读黑格尔以及当时意大利两个占主导地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克罗齐和金蒂莱（Giovanni Gentile, 1875—1944，意大利唯心主义哲学家、新黑格尔主义著名代表人物。1944 年 4 月 15 日在佛罗伦萨被游击队处决）的著作，同时每天阅读 10—15 页黑格尔的著作。就是这些书让他得以度过这段时间，一直到佛罗伦萨解放。大量阅读，为他提供了良好的哲学素养，使其能够很好地理解哲学的奥秘，并为其以后的学习和成为哲学教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萨托利自己说他并没有打算成为哲学家，也没有打算做一名教授，一切好像都是碰巧发生的。“二战”结束后，萨托利于 1946 年 11 月在佛罗伦萨大学获得社会学与政治学博士学位。但接下来的四年中萨托利一直处于彷徨之中。法西斯的残暴统治，使意大利的学校教育遭受了很大的破坏。战后，意大利政府对法西斯分子和通敌分子进行惩办和清洗，大学中有很多长期聘用的教授因被疑为通敌分子或被指控曾为法西斯政权服务而被清除出大学。政府也加强了与大学之间的联系，选拔了一批了解黑格尔哲学的学者进入大学。萨托利当时被认为是精通黑格尔哲学的“神童”而获得佛罗伦萨大学国家理论助教的职位。事实上，他是完全代替那位经常缺席的教授——庞培·毕昂迪（Pempeo Biondi, 1902—1966，佛罗伦萨大学教授，自由主义哲学家；萨托利把他称做自己的“老板”）来教授该课程的。萨托利认为毕昂迪虽然从来不是一位勤奋的教师，但他很有智慧。萨托利自感不能像他那样机智，因而促使自己不得不去阅读大量的书籍，这是毕昂迪给他上的第二课。1950 年的一天，佛罗伦萨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朱塞佩·马拉尼尼（Giuseppe Maranini, 1902—1969，意大利法学家，佛罗伦萨大学教授，尤其擅长宪政史研究）在教师会上给他的同僚们透露准备起用一位很有希望的年轻人乔凡尼·斯帕多利尼（Giovanni Spadolini, 1925—1994，1925 年 6 月 21 日生于罗马，意大利著名的政治家、历史学家。曾任意大利主要日报《晚邮报》主编，1981 年 6 月至 1982 年 12 月两度出任意大利政府总理，后出任议长）。毕昂迪不能接受没有自己的候选人，作为交易，他强烈推荐萨托利担任第一批空缺职位中的现代哲学史教职。萨托利当场被任命为助理教授（副教授，那时两者没有差别）。毫不知情的萨托利第二天就接到通知去教哲学史，一直到 1956 年。从那一刻起，萨托利就相信生活中确实有很多幸运、机会和运气。参见 Sartori, Giovanni, “Chance, Luck and Stubbornness”, In H. Daalder (ed.), *Comparative European Politics: The Story of a Profession*, London and Washington: Pinter, 1997。

后便相继受聘多所国外知名高校。1964—1965 年为美国哈佛大学访问教授，1966—1967 年为美国耶鲁大学访问教授，1976—1979 年受聘斯坦福大学、承接知名学者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的职位，1979—1994 年受聘为哥伦比亚大学阿尔伯特·史怀哲人文科学讲座教授。同时，他还于 1976 年受聘为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1978—1979 年受聘为古根海姆研究员，1979 年受聘为福特基金会研究员，1982 年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做访问学者，1988—1989 年受聘为纽约罗素贤者基金会客座研究员。

萨托利的著作甚丰，其研究主要分为民主理论、政党理论、比较宪政、政治学方法论和政治思想史五大块。萨托利涉猎的范围十分广泛，而且在许多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他的作品已被译成 30 多种语言。其 1976 年出版的《政党与政党制度》被认为是政党研究的经典之作，该书是继迪韦尔热之后创立系统政党学说的又一次重要尝试，它试图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关于政党政治的一般理论，因此其覆盖面比所描述的要广泛得多，以致有西方学者评价说：“将来对政党和政党政治的任何研究都将从萨托利的分析开始。”^① 1998 年该书获得美国政治学会优秀图书奖。《民主新论》一书是萨托利花费近十年心血完成的一部重要著作，也得到西方政治学界很高的评价。巴尔（Temlce BdI，明尼苏达大学）说：“《民主新论》对同时代关于民主的本性与民主的未来的讨论作出了重要贡献”；而李普哈特则把《民主新论》看成是“我们时代最为强大的头脑”，其论证“没有真正的对手”；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评论说：“它在未来几十年里将一直保持清新与活力。”^②

由于萨托利在政治学研究诸领域的突出贡献，也使其获得了许多荣誉。1971 年萨托利被授予意大利共和国总统金奖，1975 年成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1994 年获意大利社会科学部长理事会主席奖，2005 年获欧洲财团（ECPR）政治研究终身成就奖，2005 年获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王子社会科学奖，2006 年因其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特殊贡献获美国政治学学会终身成就奖，2007 年因其欧洲政治社会学研究的重大贡献被欧洲财团（ECPR）授予 Mattei Dogan 基金奖。

^① 转引自王长江《西方学者的两种政党观》，《团结》2000 年第 4 期。

^② 转引自〔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 1998 年版，译者说明。

尽管萨托利的著作十分浩繁，涉猎的主题也比较广博，但正如他自己所说，由于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黑色”记忆，其终生都十分关注民主。^① 萨托利为捍卫自由主义民主作出了不懈努力，既有民主理论的阐释，也有根据理想所作的制度设计与构想。本书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试图厘清萨托利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理论架构、制度构想、历史贡献及其局限性。通过透视萨托利这位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坚定捍卫者的理论，考察其民主思想在民主理念历史流变中的特殊贡献及其局限性。进而，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对萨托利民主思想的梳理和分析，有益于加深我们对自由主义民主理论与实践的认识，从而增进我们对什么是民主，什么是民主发展的正确方向，如何走出中国特色的民主道路等问题的理解。

^① Sartori, Giovanni, “Chance, Luck and Stubborness”, In H. Daalder, *Comparative European Politics: The Story of a Profession*, London and Washington: Pinter, 1997, p. 93.

目 录

导论	(1)
第一章 民主理念的历史流变与萨托利思考民主的缘起	(1)
一 民主理念的历史流变	(1)
(一) 古代民主理念的起源与沉浮	(2)
(二) 近代民主理念的“新生”和自由主义对民主的改造	(8)
二 20世纪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危机与萨托利思考 民主的缘起	(20)
(一) 20世纪民主理论的争论及其对自由主义民主 理论的挑战	(21)
(二) 20世纪中叶自由主义民主体制面临的实践困境	(33)
(三) 萨托利思考民主的缘起	(36)
第二章 民主思想房间的“清理”	(46)
一 当代民主观混乱之诊断	(46)
(一) 民主概念本身容易产生混乱和歧义	(47)
(二) 价值中立思潮的影响	(50)
(三) 行为主义思潮的影响	(53)
二 民主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与调适	(54)
(一) 民主的两张面孔和民主理论研究的两种路径	(55)
(二) 割裂民主理想与现实的三种错误	(57)
(三) 民主理想与现实的调适	(63)
三 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的差异	(64)
(一) 微型民主与巨型民主的规模差异	(65)

(二) 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形式差异	(66)
(三) 政治自由与个人自由的价值差异	(67)
四 统治民主观的迷惑性	(69)
(一) 公众舆论的人为性	(70)
(二) 选举式民主并非“人民的统治”	(72)
(三) 参与式民主不适合巨型民主政治制度	(73)
(四) 公民表决式民主存在致命缺陷	(75)
 第三章 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恢复与重建	(78)
一 自由主义民主建立的历史条件和基础	(78)
(一) 世俗化和对政治的“驯服”是自由主义民主 建立的历史条件	(78)
(二) 多元主义是自由主义民主建立的基础	(80)
二 自由主义民主的结构特征：“竞争—反馈式”民主	(88)
(一) “竞争—反馈式”民主的思想渊源	(88)
(二) 萨托利的“竞争—反馈式”民主理论以及民主 的三种定义	(92)
三 自由主义民主的可行性原则：有限多数原则	(101)
(一) 多数原则的提出及其合理性	(101)
(二) 多数原则存在的问题以及多数专制的隐忧	(106)
(三) 有限多数原则的救治	(109)
四 自由主义民主的使命：融合自由与平等	(113)
(一) 政治自由及其保障	(113)
(二) 平等的“迷宫”	(118)
(三) 融合自由与平等是自由主义民主的使命	(124)
 第四章 自由主义民主的制度构想	(130)
一 政党体制比较及其“竞争—反馈式”政党制度构想	(130)
(一) 政党的起源、特征、分类和功能	(131)
(二) “竞争—反馈式”政党体制	(145)
二 选举制度比较及其“两轮投票制”构想	(154)
(一) 选举制度的效应	(155)

(二)各种选举制度的利弊	(158)
三 宪政体制比较及其“交替式总统制”构想	(161)
(一)总统制与议会制的比较分析	(162)
(二)交替式总统制构想	(166)
第五章 萨托利民主思想的局限性	(169)
一 萨托利民主思想的内在缺陷	(169)
(一)处理民主理想与现实关系问题上的局限性	(170)
(二)处理自由与平等关系问题上的局限性	(185)
(三)处理精英与大众关系问题上的局限性	(197)
二 通过比较看萨托利民主思想的局限性	(207)
(一)萨托利和达尔处理民主理想和现实关系的差异	(209)
(二)萨托利和达尔对待政治平等的差异	(212)
(三)萨托利和达尔对待经济民主的差异	(216)
结语	(221)
参考文献	(225)
附录 萨托利生平著作年表	(243)
后记	(249)

第一章

民主理念的历史流变与萨托利 思考民主的缘起

萨托利是较早对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和实践作出全面分析与捍卫的当代民主理论家之一。从 20 世纪 50 年代末开始，面对自由主义民主所遭遇的挑战，萨托利在继承前人民主理论的基础上，对民主相关概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试图在混乱的意义中追寻民主的明确定义。按照谢洛维的观点：“民主理论并非在真空中发展，它不仅是整个哲学发展的一部分，而且是一般政治理论与历史的一部分。更为重要的是，或许每位民主理论家都是在历史的浪潮中著述——以回应其周遭的某些政治与文化事件。”^① 因而，为便于更清楚地理解萨托利的民主思想，我们有必要首先对民主理念的历史流变和萨托利思考民主的缘起进行全面的回顾与分析。

一 民主理念的历史流变

民主具有 2500 多年的历史，但在 19 世纪以前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民主”很长一段时间是被主流政治思想所诟病的一个名词；直到 18 世纪，它才蹑手蹑脚地回来，还是被当作一个轻蔑的用语；“即使法国大革命以前的哲学家，也很少有人以赞许的口气使用民主一词”^②。但随着 19 世纪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工人阶级争取普选权的斗争日益深入，民主逐渐成为多数社会政治思潮共同高举的一面旗帜，成为整个世界头等重要的政治目标。下面，我们可以从民主理念的历史流变来看它是如何蹒跚

^① Charles M. Sherover, 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emocratic Idea*, New York: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Inc., 1974, p. xvii.

^② R. R. Palmer, “Notes on the Use of the Word ‘Democracy’ 1789 – 1799”,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68, 1953, p. 205.

着从古代一路走来。

（一）古代民主理念的起源与沉浮

1. 古代民主政治实践与民主理念的起源

人们一般认为，民主的观念和制度起源于古希腊的城邦，正是智慧无穷的古希腊人，播下和培育了民主的种子。从公元前 800 年到公元前 500 年，城市文明在希腊世界慢慢形成，早期阶段的希腊城邦表现为氏族贵族独占政权。但是，在一些城邦中，氏族贵族独占统治的情况并没有长久维持下去。例如雅典，在平民反对贵族统治的斗争中逐渐产生了民主政体。雅典是在梭伦担任执政官之后开始步入民主轨道的，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指出，梭伦在公元前 592 年进行的第三次宪政改革“开始了民主政治”^①。

梭伦之前的古代雅典是贵族制的城邦，梭伦担任执政官后利用手中的最高权力，对雅典的政治和经济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他设立公民大会，选举城邦的管理人员，讨论和决定城邦大事，所有城邦公民不论财产多寡均可参加公民大会。同时设立四百人议事会，作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关，其职能是为公民大会作各项预备，议事会“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有意识的、内容明确而且年代可考的政治革新”^②。梭伦还首创人民陪审法庭制，这项制度对公民参与审判进行确认和推广，它是雅典司法民主化的重要举措。“梭伦改革确立的以公众参与城邦政治生活为内容的一整套政治制度，包括公民大会、四百人议事会、公职选举、公民陪审制度等，也成为整个希腊世界中民主制的象征。”^③

梭伦之后，雅典经历了一段无政府时期，后来又陷入皮希特拉图家族的僭主统治。到公元前 508 年，雅典在克里斯提尼的领导下开始了民主政治发展史上著名的第二次改革。克里斯提尼的改革对雅典民主政治起到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地域来划分选区，彻底摧毁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部落组织；改四百人议事会为五百人议事会；制定贝壳放逐法。到克里斯

^① 转引自施治生、郭方《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67 页。

^② [英] 约翰·邓恩：《民主的历程》，林猛译，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6 页。

^③ 徐大同、王乐理：《西方政治思想史》第 1 卷，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3 页。

提尼改革为止，雅典城邦已经基本上确立了以“权力在民”和“轮番为治”为特色的民主政体。雅典城邦制度进入成熟阶段，雅典在此后的希腊世界中如日中天，成为许多城邦相继效法的楷模。民主政体成为古希腊各种纷繁政体中的一种最为重要、最具代表性的政体形态。^①

而作为一种明确的民主概念，大概是在晚于克里斯提尼改革半个世纪才出现的。在约公元前 463 年发表的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恳求的妇女》中，为逃亡妇女群体代言的歌队与主人公达诺斯就阿尔哥斯公民大会通过的接纳并善待她们的决议提问时说：“人民执掌的权力是如何做出的决定？”其中“人民执掌的权力”用三个词 δῆμον κρατονσα χειρ 连缀而成；恰在这个时期，有人为自己的儿子起名为△ημοκρατεΣ，也就是说这时不但有了人民权力的句式，而且衍生出了民主一词的组合词根，只缺一个适当的后缀便可成为概括一种特定政体的专有名词。一二十年之后，希罗多德的《历史》头一次在政治概念的意义上使用了民主一词，并且都是在叙述与雅典人相关的事件时提到的。较希罗多德稍晚的伪色诺芬则是第二个使用这个词的人，并且同样是在讨论雅典政体问题时运用这个术语，这表明至少在公元前 5 世纪 40—20 年代，“民主”作为城邦政体已在雅典人的口语和书面语中普遍流行。^②

到伯里克利担任执政官的公元前 443—前 429 年，雅典的民主政治达到鼎盛。由选举产生的十将军取代了由抽签产生的行政执行官，公民大会对他们制定的各项政策都要经过讨论通过。伯里克利为使全体公民不论贫富贵贱均能参加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并为下层平民参与公职提供更多的机会，还在其执政时期实行公职津贴制度，甚至还提供观戏津贴，以提高公民的整体素质。这些措施为政治生活进一步向下层公民开放和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但在伯里克利之前，“民主”还没有易于操作和把握的内涵，无论字面上的“人民权力”，还是“一切事务取决于人民”的释义，也都没有划定概念的明确边界，即人民权力的具体表现方式。公元前 431 年，伯里克利在悼念阵亡的雅典英雄葬礼上的演说，则为民主概念下了一个比较明晰的定义，并且也最能体现希腊民主精神，他说：“我们的制度是别人的模

^① 徐大同、王乐理：《西方政治思想史》第 1 卷，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4 页。

^② 施治生、郭方：《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89 页。

范，而不是模仿任何其他人的。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让一个人担负公职优先于他人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某一个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们有的真正才能。任何人，只要他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正因为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我们彼此间的日常生活也是这样的。当我们隔壁邻人为所欲为的时候，我们不至于因此而生气；我们也不会因此而给他以难看的颜色，以伤他的情感，尽管这种颜色对他没有实际的损害。在我们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和宽恕的；但是在公家的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这是因为这种法律深使我们心悦诚服。”^① 这是雅典民主政治所具有的“主权在民”、“轮番为治”原则的体现。当时，“大多数雅典人对他们的制度都深感自豪并为它所深深吸引。很少的几次颠覆——在公元前 411 年、公元前 404 年、公元前 322 年和公元前 317 年——是由极少数极端分子进行的”，“并且所有这些都是短命的，很快就被人民大众推翻了”^②。

雅典民主也对当时的希腊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希波战争第一阶段结束后，许多希腊城邦摆脱了本国的贵族统治，如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阿哥斯（Argos）和西西里岛上的叙拉古，都紧随雅典建立了民主政治。在公元前 5 世纪和公元前 4 世纪，民主制成为一种更为普遍的制度，爱琴海沿岸及众多岛屿上的城邦，在雅典军事力量的影响下，大都采取了民主制。据说，亚历山大大帝在从波斯统治之下解放希腊城邦的同时，也在一些城邦取消了寡头制，建立起民主制度。除此之外，公元前 4 世纪的历史学家、演说家和哲学家也都提到民主制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刻在石头上的国家法令反映出民主机构有所扩展的趋势；相关的铭文资料也显示，古典时代以后，民主制度在希腊各城邦中仍然很流行。^③ 甚至在公元前 4 世纪，还“出现了对‘民主’的崇拜，公元前 5 世纪就有对‘民主’的献

^① [古希腊]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 1960 年版，第 147 页。

^② Jones. A. H. M. , *Athenian Democracy*, Oxford, 1957, p. 42.

^③ 魏凤莲：《古希腊民主制研究的历史考察》，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6—8 页。

祭，不止一艘战舰命名为‘民主号’”^①。

2. 古代民主政治的批评者以及民主政体的衰亡

不幸的是，民主自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似乎注定是一个命运多蹇的苦命儿。就在数以百计的古希腊城邦广泛实行民主制度时，众多批评民主的声音也开始出现。在雅典民主政治史中，始终存在着一股反对民主的思潮，实践中的民主政治家们，如伯里克利和德库斯提尼，好像并不认为有必要将他们有关民主政治的思想系统地写下来，因此几乎所有保存下来的同时代的政治理论和评论，或多或少都是反民主的。^② 美国古史学家琼斯曾感叹地说：“令人奇怪的是，在产生了丰富文学的希腊最伟大的民主国家里，却没有留下关于民主政治理论的记载。我们所拥有的所有雅典政治哲学家和政治评论家的著作都在不同程度上是寡头制的同情者。”^③ 伯林也表达过类似的感慨，“一个巨大的历史矛盾是，民主是雅典最伟大的政治荣耀，但是它所受到的辩护如此之少，以至于那时存在的几乎所有著作家从某种程度上说都是它的敌人或批评者”^④。阿克顿更是明确指出：“希腊以它的哲学统治世界”，但“希腊哲学中最响亮的声音”却“是对雅典民主制的抗议”^⑤。实际上，从雅典民主政治繁荣时期的伪色诺芬（也被称为“老寡头”）、修昔底德到苏格拉底、柏拉图、色诺芬等基本上都对雅典民主持批评态度。

伪色诺芬是雅典民主政治繁荣时期对民主进行批评的集大成者，他在《雅典政制》开头便表明了其反民主的态度和理由：“关于雅典人的国家体制，我对之并不欣赏，因为他们在为自己选定它之后，也就因而选定了一种使平民日子过得比贵族还好的制度”；“如果有人感到奇怪，雅典人

^① [英] 约翰·邓恩：《民主的历程》，林猛译，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9 页。比如，在鲍德欧民翁月（Boedromion）的第十二日，雅典人要向民主女神贡献祭品，把这一天定为恢复民主政治的纪念日。公元前 336 年，雅典人还通过一项反僭主的法律，在刻有法律条文的石碑的顶部，刻画了一个代表雅典成年公民的男子，民主女神正为其加冕。这些反映了雅典人对民主制的追求和向往，以及民主思想在雅典人心中的根深蒂固。参见魏凤莲《古希腊民主制研究的历史考察》，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7 页。

^② [英] 卡特里奇：《剑桥插图古希腊史》，郭小凌等译，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37 页。

^③ Jones. A. H. M. , *Athenian Democracy*, Oxford, 1957, p. 41.

^④ [英] 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胡传胜等译，译林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39 页。

^⑤ [英] 阿克顿：《自由史论》，胡传胜等译，译林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60 页。

怎么对穷人以及整个平民都较贵族在各方面都受优待，那么这正像目前所证实的那样，他们保持民主就是对这些人而言的”。而伪色诺芬的同代人修昔底德则是另一位有代表性的批评者，不过据普鲁塔克的材料分析，修昔底德并不反对民主本身，只反对伯里克利深化民主的某些措施，如各种公共福利政策；此外他同其他贵族对伯里克利过高的个人威望怀有恐惧，害怕将对民主构成威胁，将民主制改为君主制。苏格拉底则认为“用抽签的方法来选择城邦的领导人是非常愚蠢的”^①。而柏拉图则对民主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他将民主政体定义为“一种使人乐意的无政府状态的花哨的管理形式”^②。他提出，民主制下的统治是建立在对富人的掠夺和对穷人的欺骗基础上，“他们的那些头头，劫掠富人，把其中最大的一份据为己有，把残羹剩饭分给一般平民”以诱取他们的支持。^③ 民主制下的人们“一天又一天地沉迷于轮到的快乐之中。今天是饮酒、女人、歌唱，明天又喝清水，进严格规定的饮食；第一天是剧烈的体育锻炼，第二天又是游手好闲，懒惰玩忽；然后一段时间里，又研究起哲学。他常常想搞政治，经常心血来潮，想起什么就跳起来干什么说什么。有的时候，他雄心勃勃，一切努力集中在军事上，有的时候又集中在做买卖发财上。他的生活没有秩序，没有节制。他自以为他的生活方式是快乐的，自由的，幸福的，并且要把它坚持到底”^④。柏拉图认为这种性格特征可以用放纵来加以概括。

作为古希腊民主思想观念的全面总结者和最深刻的思考者，亚里士多德对民主的评价则是比较矛盾的。在《政治学》一书对政体的分类中，亚里士多德对六种政体类型中的极端民主制持严厉的批判态度，他认为民主制下的平民，“他们为政既不以‘法律’为依归，就包含着专制君主的性质。这就会渐趋于专制，佞臣一定取得君主的宠幸而成为一时的权要。[多数制中的]这种平民政体类似一长制（君主政体）中的僭主政体。两者的情调是一样的，他们都对国内较高尚的公民横施专暴，平民群众的‘命令’有如僭主的‘诏敕’，平民领袖（德谟喀葛）就等于、至少类似僭主的佞臣；在这种平民政体中，好像在僭主政体中一样，政权实际上落

^① 施治生、郭方：《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5—300页。

^②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33页。

^③ 同上书，第282页。

^④ 同上书，第278页。